



徽学与地域文化丛书

新文化运动与安徽

——汪 杨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新文化运动与安徽

汪杨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化运动与安徽/汪杨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4. 12
(徽学与地域文化丛书)

ISBN 978-7-5664-0419-0

I. ①新… II. ①汪… III. ①五四运动—研究—安徽省
IV. ①K261.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9843 号



汪 杨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安徽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2mm×228mm
印 张: 10.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ISBN 978-7-5664-0419-0

策划编辑: 朱丽琴 刘 强
责任编辑: 姜 萍
责任校对: 程中业

装帧设计: 知耕书房
美术编辑: 李 军
责任印制: 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文化运动
与安徽(09YJC751001)”青年项目资助

徽学与地域文化丛书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吴春梅

编委会副主任:(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利 张子侠 张能为 鲍恒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利 王国良 王达敏 王天根

王成兴 江小角 李霞 张子侠

张能为 张崇旺 张爱冰 张金铨

吴春梅 吴怀东 吴家荣 陆建华

陈林 宛小平 徐国利 鲍恒

前言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在中国文学研究中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一个重要学术点。这场运动全面触动了当时的社会架构，促使中国进入现代“转型”之途。同时，这场运动还见证了中国社会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聚集、生成与发展。新文化运动以及由其催生的现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不论是在文学上、思想上，还是在社会政治上；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给中国造成了深远影响，成为研究者们把握中国文化脉搏的一个关键点。与中国近代其他历史运动相比，新文化运动显然是受到了学术界更加广泛的关注，无论是探讨中国近现代文化，还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新文化运动都成为学者们论述的基点。对于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今知识分子而言，这场文化运动的意义已不仅仅在于推行白话文运动和开启新文学的方向，而是它已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精神标杆。

因此，时至今日，新文化运动研究对于文学本身及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关于五四，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阐释系统：一个是政治的，或者称作政治家的；一个是文化的，也可称作知识分子的自我阐释”^①。“五四的最大成就，

^① 林贤治：《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就是造就了大批新人:现代知识分子”^①。“‘知识分子’一词,于1920年代末才开始在五四的继承者中使用。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启蒙的先驱者都不曾找到合适的名词为自己命名,五四则为其开出了一张‘明确的出生证’”^②。从这个角度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的‘创世纪’”^③。

以安庆和芜湖为中心兴起的安徽新文化运动,无论其规模,还是其发展、表现,在全国都很有代表性。在新文化运动中,近现代安徽知识分子群体也是颇值得关注的:不仅有陈独秀、胡适等闻名全国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还有一批皖籍新型知识分子,如刘文典、李光炯、汪孟邹、蒋光慈等,他们一直都在指导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更有被论争所遮蔽、同样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影响力的桐城派文人。事实上,这些皖籍知识分子群体也是中国近现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缩影。

这些皖籍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参与构建本地文化,以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他们又是如何突破地域限制,与国家的文化话语相整合?这些学术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从人员数量、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来看,皖籍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具备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资格。将其作为新文化运动个案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是为了还原皖籍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学、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厘清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源流。事实上,将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潮流与作为发源地之一的安徽关联在一起进行研究,以探求什么样的区域文化氛围孕育了中国现代这批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又怎样参与到全国性的新文化建构中;将单一的区域及代表人物研究与全国性文学、文化思潮探讨相结合进行探讨,一方面能够丰富地域文化研究,

① 林贤治:《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② 林贤治:《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③ 林贤治:《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拓宽学术视野,另一方面也能健全学科体系,进一步扩展新文化运动的研究领域。

本书以三个部分展开论述,首先通过对新文化运动前安徽的全景透视,阐述这场运动与安徽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然后从文化和教育两个层面还原和勾勒新文化运动在安徽的发展情况;最后分析旅外皖籍知识分子在全国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以及这一群体与安徽本地新文化运动的关联,解读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思想底色。

为何新文化运动最初的领导者大多来自安徽,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时代的必然?向全国输出了这么多新文化运动先锋的安徽,在这场运动中又呈现出怎样的情形?是怎样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催生了皖籍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皖籍知识分子群体虽因地域命名,但从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发展脉络来看,他们并没有将自己视作仅属于某一地域的群体,相反地,在叙述他们所倡导的新文化思潮时,更强调的是“国家”而非“地方”。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由于前期参与人员的地缘关系,相对于当时中国其他省区而言,新文化运动思潮在安徽的普及度和渗透度都是广泛而深远的,安徽的知识分子通过各种人脉关系,第一时间将这股新文化运动思潮传入安徽,直接导致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得安徽新文化运动无论在运动的声势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曾一度位于全国前列。在安徽本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报纸刊物应运而生,这些报纸刊物在宣传新思想,激发普罗大众和青年人的积极性的同时,也记录了安徽本土新文化运动的进程,成为后人研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材料。革新教育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当时掀起的革新教育的学潮正是新文化运动在教育界的集中体现,而新教育体系的创立是新文化运动在安徽教育文化层面进一步深入的结果。安徽大学的筹备和创立则是众多皖籍新型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共同努力的结果。

为什么在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中,皖籍知识分子可以占据主导位置?皖籍知识分子群体又是如何调适或营造自己的话语空间,来促使新文化运动思潮在全国的扩散?本书最后一部分

集中梳理了皖籍知识分子群体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聚集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共同的思想底色,包括文本思想解读、学术发展以及群体社会交往等。厘清这一群体在全国新文化运动中的联系脉络,有助于了解新文化运动从地方到全国的发展轨迹,进一步探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核心。地域情结固然是构成皖籍知识分子聚集的首要因素,但是共同的思想基点、价值认同与追求,才是他们得以合作和联络的情感纽带、内在动因,也是这一群体在新文化运动中会聚的缘由。这些皖籍知识分子同仁们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和学统关系为经纬,促发并推动了这场全国性的新文化思潮。与此同时,他们对于安徽本土文化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除维系和加强当地同乡之间的互助关系外,他们始终关注和推动着本土社会的变化与发展。简言之,皖籍知识分子群体既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和参与者,也是安徽本土新文化运动的奠基者和组织者。

目 录

001 前言

001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前安徽的全景透视

001 第一节 孕育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

014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前安徽的教育文化

032 第三节 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057 第二章 新文化运动在安徽

057 第一节 文学界的情况

073 第二节 教育界的情况

096 第三章 皖籍知识分子与新文化运动

096 第一节 《新青年》的皖籍作者群

113 第二节 北京大学的皖籍学者群

131 第三节 皖籍知识分子与安徽本土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139 结 语

146 参考文献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前安徽的全景透视

第一节 孕育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

新文化运动前的安徽,其所辖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自 1667 年安徽设省起,到 1938 年日军侵皖,作为安徽省会的所在地,安庆一直是安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吸引着众多知识分子的目光,也当仁不让地成为后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城市;而芜湖^①则是当时安徽经济的枢纽,商业发达,重要的物资和商品皆以芜湖为集散地,英、日两国还在此设有领事馆。从地理位置和社会综合条件来看,芜湖无疑是当时安徽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最大的地方,自然它也就成为孕育新文化运动思潮的重要地区。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尤以安徽主要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安庆和芜湖为烈”^②,陈独秀等人也大都围绕安庆和芜湖这两个城市开展早期的社会文化活动。

即便地处内地,安徽也早已受到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西方的教会文化正是对清末安徽社会形态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① 胡绳主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就认为芜湖是当时中国 7 个五四运动的典型城市,这 7 个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

② 李则刚:《安徽青年的觉醒与反帝反军阀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 2 辑),1982 年,第 49 页。

之一。西方教会在当时政府的默许下,通过传教、设立教会学校等手段,强化对安徽的文化渗透,极大地冲击了当地的传统文化,也打开了安徽通向西学之路。

在社会变革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安徽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并在社会事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从文化启蒙入手,最终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安庆藏书楼演说标志着陈独秀等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在安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这次演说还为后来全国性新文化运动积累了人脉、奠定了基础。岳王会的成立,使得安徽知识分子的新文化主张与新军武装力量结合起来,这也使这些知识分子得以冲破地域和群体限制,迈上更大的社会舞台。

一、安徽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

晚清的安庆是安徽的政治、文化中心,“民俗刚毅,有死守善道之风,一旦为革命主义所熏陶,故匹夫慕义,杀身以成仁者,史不绝书”^①。安庆位于长江下游,上至九江、武昌,下达芜湖、南京、镇江、上海,在整个长江航道中的位置非常重要。康熙年间编修的《安庆府志》就曾指明安庆是“滨江重地也。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中流天堑,万里长城”^②。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安庆在军事上的重要位置,“地介吴楚,襟江流而蔽淮服,天下无事则已,有事辄先受兵”^③。1861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就曾在安庆“分设谷米局及制造火药、子弹各局,委员司之……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④。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还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新兴工业——安庆内军械所。与此同时,“清代的安庆是安徽省、安庆

① 孙传瑗:《安徽革命记略》,《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82页。

② 《安庆府志·碑记(卷二七)》,康熙年间。

③ 《怀宁县志·官署(卷一〇)》,道光年间。

④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49页。

府和怀宁县的政治中心,这里官员集中,衙门充斥”^①,”安庆为省治,各省之人宦于斯、幕于斯、泊鼓于斯者不知凡几”^②;作为安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安庆长期吸引着全省和其他地区的士绅,特别是全省乡试及提学岁试的时节,全省的生员都要来这里参加科举考试,有时仅“怀(宁)、桐(城)两县,各三千数百人”^③。随着安庆寄航港的开辟,西方势力对安庆的影响也不断加大,从文化逐步延伸到经济、政治等方面。聚集在安庆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由不理解到理解,由被迫妥协到自觉吸收,并逐步萌发了初步的革新意识。

芜湖则是当时安徽南方地区的行政中心和文化中心。芜湖是当时长江、青弋江、水阳江诸水的汇集点,自明清以来就一直是安徽的重镇;清朝末年,清政府就在此设有徽宁池太广兵备道官员,用以统辖皖南各府。芜湖还是安徽重要的商业城市,是当时长江下游一个较大的商埠,也是皖南的经济中心;芜湖商业兴旺,早在19世纪就已是全国闻名的米市,米业盛况空前一时,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通商以后,输运出口如是……光绪二十四年至三十年出口数多至五百余万担,少亦三四百万担”^④。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使得芜湖成为安徽第一个受到西方列强冲击的城市。条约强令中国扩大长江流域的开放,增加芜湖、宜昌等地为通商口岸。在这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外国势力开始在芜湖开辟租界,建立教堂,设置海关,开设洋行,芜湖因而变成帝国主义向安徽倾销商品的重要据点。根据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设立的芜湖海关,是当时中国四十多处海关之一。由于清政府不习洋务,不懂税收,竟邀请英人来帮助办理税务,税务司、帮办、书记等高级职员全部启用外国人。虽然清廷在芜湖海关派有监督,但税收的相关

① 朱庆葆:《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清末民初安庆城市近代化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页。

② 程小苏:《安庆旧影》(未刊稿),合肥:安徽省图书馆藏,第148页。

③ 程小苏:《安庆旧影》(未刊稿),合肥:安徽省图书馆藏,第42页。

④ 《芜湖县志·商业志·米业》(民国八年本),沈寂:《芜湖地区的辛亥革命》,《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6期。

事宜实际上是由总税务司决定,芜湖海关的大权完全操纵在外国官员手中,这造成了政策的倾斜及商品倾销的加速,贸易不平等日益加剧,西方商品渗透也日趋严重。芜湖正式开埠以后,其内外贸易都迅速增长,租界、洋行纷纷建立,外国商品通过芜湖倾销到安徽内地,而安徽内地的农产品也通过芜湖向外出。许多进出口商品,均由这里转发各地,“自一八七六年到一九一六的四十余年中,英、日两国的商品和金融,几乎控制了芜湖整个市场”,“当时市场上除英、美的煤油、香烟外,大街小巷的商店、摊贩,无一不经售洋货”^①,“此间芜湖试办各种企业,迄今没有一家能称得上成功的……本地所制肥皂及蜡烛,从来没有建立销场”^②。芜湖的开放标志着西方强权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正式进入安徽,安徽“与外邦发生直接关系之始,厥为芜湖租界之开辟”^③。这种从政治到经济直至文化的全方位入侵,极大地冲击了安徽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和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农业文明,造成安徽整个社会形态的急剧震荡。

正是因为这两个城市在当时安徽的重要位置,才使得生于斯、长于斯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在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冲击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的严峻现实并自觉地承担起救亡图存的责任。救亡意识促使他们革新理念,促使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中吸取革命和民主的思想和观念,这样,安徽乃至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由此拉开。

二、教会势力对安徽文化的影响

安徽虽地处内地,受西方商品倾销的影响要远远晚于其他通商口岸,但早在芜湖开辟租界之前,安徽就已经受到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西方教会文化首当其冲侵入安徽,“基督传教

① 《芜湖县志》卷五,转引自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页。

②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846页。

③ 《安徽通志稿·外交考》,转引自朱庆葆:《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清末民初安庆城市近代化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2页。

士加上兵舰,终于逼使文弱的、以农为本的古老中国步上现代工商业的道路”^①。早在明末清初,以利马窦、汤若望为代表的教士就已经来到中国传教,教会的影响因而开始进入中国,并随之遍及全国。“晚清最早出国留学始于1846年,容闳、黄宽、黄胜三人是最早的受西方教会资助的留学生。他们都是‘马礼逊学堂’的学生,受教会资助,前往美国留学”^②。“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大力翻译介绍传播‘西学’,一方面继续延续了明季天主教传教士们着眼于本土文人的考量,但在此之外,新教来华传教士更关注的,似乎是‘西学’整体上相较于‘中学’(儒家传统思想学术)的实用性和优越性,也就是说,到了晚清,在新教来华传教士这里,‘西学’已经不再只是补充‘中学’的缺陷和薄弱处了,而是具有整体性的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正是在从比较优势到整体优势或者绝对优势的转变之中,西方的整体优越感已经逐步确立,而新教来华传教士们大力译介西学,则是为了用这种更实用、更科学、更精确的学问,来改造甚至替代落后、保守、古旧的‘中学’。不仅如此,他们也希望凭借着‘西学’所确立起来的‘西方优越性’,来借势宣扬新教信仰”^③。

教会势力最大的是天主教的江南教区,而这个教区恰恰就管理着由江苏、安徽两省组成的江南省的传教事务。1865年,戴德生在伦敦成立了基督教新教的“内地会”,其目的正是为了向中国传教,而安徽则成为这一教会进行活动的重要区域。传教士们一是以皖北的老传教据点五河为中心,逐渐向凤阳、泗县以及皖北的其他地区扩张;二是以省会安庆为中心,向长江对岸的池州和皖西山区的六安、霍山等地扩展;三是从最早建立教堂的徽州的东门镇、宣城的水东镇等开始,逐步向宁国、广德、太平、芜湖等地发展,最后在皖南形成一张传教势力网^④。

① 蒋梦麟:《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43页。

② 焦润明、苏晓轩:《晚清生活掠影》,沈阳:沈阳出版社,2002年,第95页。

③ 段怀清:《传教士与晚清口岸文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④ 《安徽革命史话》(上),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49页。

1921年,梵蒂冈天主教廷还在安庆城建立了天主教大教堂,正式成立了安庆教区。“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传教士在中国办学校发展很快。1876年,基督教学校已有350所,学生总数为5975人。到1889年,教会学校学生已达16836人,可见教会学校的势力和影响。西方传教士通过教会音乐,即通过‘颂扬上帝’的形式,达到‘感化’中国人(的目的)”。“晚清新教传教士面对中西语言、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差异甚至激烈冲突的现实,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采取了直接布道和文化传播两种活动方式”。“而他们进行文化布道的首要方式就是译介西方的科技、文化,包括文学知识”^①。“传教士译介的作品通过他们创办的学校、报刊、出版物、书店以及中国人模仿他们创办的类似机构,多渠道、全方位地传播”^②。“晚清时代,尤其是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部分基督教传教士(主要是新教徒)却在中国开展了长时间、大规模的世俗文化活动”^③。

这些传教士尽管客观上也带来了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但是其主要意图是为了扩大宗教影响,或是为了配合西方的侵略步伐。他们通过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的宗教文化,从而使中国人确立起新的价值理念,正如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所说:“传播基督教的工作,很适当地被比作军队的工作。军队的目的,不单是尽量杀伤和擒获敌人,乃在征服全部敌人……基督教的工作目标也是一样,它不单是在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使之服从基督。”^④这在安徽无疑造成了以人伦礼教为核心的儒家传统与西方的教会上帝文化之间巨大的差异和冲突。1869年的“安庆教案”、1876年的“皖南教案”、1891年的“芜湖教案”和1904~1906年的“霍山教案”,就是近

① 何绍斌:《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史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4页。

② 何绍斌:《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史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48页。

③ 何绍斌:《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史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94页。

④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代初期安徽民众对于以枪炮为后盾的西方文化的抗拒的反映。其中造成“芜湖教案”发生的直接因素是在当地民众中出现了大量的反洋教宣传品,如《齐心拼命》、《灭鬼歌》等。就现在的眼光看,彼时的反洋教宣传有不少反科学的成分,带有极强的民族情绪,但反洋教斗争的爆发集中体现了安徽民众对于西方的宗教观念以及西方礼俗的责难和排斥。

1757年,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此后虽有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一直处于非法状态,鸦片战争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1845年,道光皇帝同意“弛禁”天主教,免除以往的禁教法令。因此,面对民众的自发反抗,清政府采取的政策是:“一、杀戮、监禁反教会的首领;二、饬令地方官员派兵保护教堂、教士;三、赔偿教会教士的所谓损失;四、向教士、外国领事馆谢罪。”^①在此背景下,安徽民众最终并没能抵制住西方教会势力的影响,反而促使教会在安徽获得合法化地位并得以更顺畅地深入安徽内地;西方教会的影响,也从最初单一的教堂内传教扩展到安徽教育和文化宣传领域。教会学校开始在安徽招收学生,宣扬基督上帝,“在校学生都要参加集体的宗教崇拜活动”^②。当时安徽的教会学校规定《圣经》为学生必修的德育课,凡《圣经》不及格者,就不准升学、毕业,同时教会学校以毕业后可以直升教会大学、出国留学、做神父等优越条件诱惑青年学生信教。与此同时,当时的教会学校也传播了西方文化。根据《安庆圣保罗中学史话》一书记载,这些教会学校相当重视英文教学,学生入校时,给每人起一个英文名字;中文教学每天只有一二小时,其余课程全为英文,英文课程采用的全是西方原版教材,而且教会学校对学生采用硬性规定:从课堂用语到自习、早操用语,全部都用英语进行;有的教会还办有刊物,“先后在芜湖、安庆发行双月刊、月刊、半月刊和周刊等各种刊物。同时在上述

①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1页。

② 安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庆文史资料》(第25辑·民族宗教专辑),1994年,第294页。